

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发展

——迈向贸易强国的理论与政策

◎ 李汉君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发展

——迈向贸易强国的理论与政策

◎ 李汉君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发展——迈向贸易强国的理论与政策/李汉君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 - 7 - 5095 - 0936 - 4

I. 中… II. 李… III. 对外贸易 -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F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4196 号

责任编辑: 耿 伟

责任校对: 张全录

封面设计: 孙俪铭

版式设计: 汤广才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960 毫米 16 开 13.75 印张 230 000 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0936 - 4/F · 0774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果,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使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以发挥,为我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调剂市场余缺到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外贸易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社会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的重要因素。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只有206.4亿美元,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达到1.15万亿美元,在世界出口和进口排名中均已位居第3位,中国由贸易小国成长为居世界第三位的贸易大国。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进出口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首次跃上2万亿美元的新台阶,继续稳居世界第3位,其中,出口1.22万亿美元,名列世界第2位。我国已成为世界的贸易大国。

我国虽然已是贸易大国,并逐步向贸易强国的方向迈进,但还不是贸易强国,与其他贸易强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我国的贸易结构虽不断改善,但总体位于产业低端,出口商品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体;对外贸易核心竞争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知名品牌和营销网络;贸易增长方式粗放,出口效益不高;我国贸易条件的总体恶化;服务贸易相对落后;缺乏在世界贸易中的话语权;贸易摩擦频繁。因此,树立科学的贸易发展观,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成为我国新时期贸易发展的宏伟战略目标。

本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实践为基础,从理论、实践和政策等方面分析和研究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本书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体制变迁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历程,然后,从我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的现状出发,针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和研究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理论和政策。

本书分为七章,第一章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本章首先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过程,然后探讨了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对对外贸易、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章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本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现状和特点,论证了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分析了我国与贸易强国的差距,探讨了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战略措施。第三章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理论与对策。本章分析和比较了贸易发展战略的内涵、类型以及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制定的理论基础,对我国外贸发展战略的历史进程、绩效和选择进行了分析。第四章加快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本章分析了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和理论基础,在分析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对策。第五章促进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本章首先阐述和分析了加工贸易的涵义和相关理论基础,然后对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特征和作用进行分析,研究了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方向、路径和对策。第六章实施“走出去”战略。本章分析了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内涵、提出的过程和重大意义,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优势和理论基础,针对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进一步深化“走出去”战略的对策。第七章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本章阐述和分析了我国贸易摩擦的现状和主要问题以及中国屡遭贸易摩擦的原因和影响,然后分析了积极应对贸易摩擦的对策和措施。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的著述和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限于作者的水平和能力,书中一定存在许多疏漏和不足之处,请不吝批评指正。

作者

2008年8月8日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	(1)
第一节 制度与贸易概述.....	(1)
第二节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过程与特点.....	(10)
第三节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效果.....	(27)
第二章 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33)
第一节 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	(33)
第二节 我国与贸易强国的差距.....	(48)
第三节 向贸易强国转变的战略措施.....	(54)
第三章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理论与对策.....	(60)
第一节 贸易发展战略的内涵、类型和比较.....	(60)
第二节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和选择.....	(72)
第三节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历史进程、绩效和选择.....	(86)
第四章 加快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	(105)
第一节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和理论基础.....	(105)
第二节 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中的问题与对策.....	(112)
第五章 促进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129)
第一节 加工贸易的涵义和相关理论基础.....	(129)
第二节 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特征和作用.....	(136)
第三节 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方向、路径和对策.....	(147)

第六章 实施“走出去”战略	(155)
第一节 “走出去”战略形成的内涵和意义	(155)
第二节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162)
第三节 “走出去”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177)
第七章 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	(193)
第一节 我国贸易摩擦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193)
第二节 我国贸易摩擦的原因和影响	(198)
第三节 积极应对贸易摩擦的对策和措施	(204)
参考文献	(211)

第一章 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

第一节 制度与贸易概述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人力资源及技术进步等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制度及制度变迁都是外生给定的。直到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的研究之中,揭示了制度创新的内在机制和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论证了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的基本原理。

一、制度、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

(一) 制度

“制度”(institution)一词源自拉丁词“institutio”,本义是风俗、习惯、教导、指示等。“institution”除了制度、风俗、习惯、设置、规则、规范等含义外,还有公共机构、协会、学院等含义。我们把institution翻译为制度,相应地把institutional economy翻译为制度经济学。在牛津大辞典中institution被定义为:一种已经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建立起来或长期形成的法律、风俗习惯、组织或其他因素。一种遵从于一个有组织的社团或作为一种文明的总的结果的有规则的原则或习俗。在《辞海》中,“制度”的注解有以下三个:(1)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或行动准则,如工作制度。(2)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如社会主义制度。(3)旧时指政治上的规模法度。

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制度(institution)通常是指“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构的所有机构、组织、法律、准则、惯例、信念、观点、价值标准、禁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行为方式”(保罗·R. 格雷戈里和罗伯特·C. 斯图尔特,1985)。舒尔茨将制度分为四类:(1)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如货币、期货市场等;(2)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如合约、公司、

保险等；(3) 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之间联系的制度，如财产法等；(4) 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框架的制度，如学校、农业试验站等（舒尔茨，1994）。由此可见，制度是人为设定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但都能约束个人的行为。而制度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①

（二）制度变迁理论

1. 制度变迁的内涵。制度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所谓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转换、替代过程，是以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有的低效率的制度，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边际调整的过程，大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及其变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也使得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② 在正统经济学中，制度被视为既定的；而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制度的变迁是至关重要的。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近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推动下，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分析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当新制度所能产生边际收益相当于旧制度运行所需付出的边际成本时，制度变迁就会暂时停止，制度结构就达到某种“均衡”；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和“供给”。

2. 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与制度均衡。制度需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所需制度的数量和质量的总和。由于制度种类的多样性和结构的复杂性，引致制度需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舒尔茨认为，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需求，而制度是为适应新需求进行的滞后调整。拉坦认为，制度变迁是由对追求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所引致的。

制度供给是指一定时期内社会所提供的制度的数量和质量的总和。制度供给不当主要体现在：(1) 制度供给不足。对新的制度需求的产生往往先于制度的实际供给的形成，从而造成了制度有效供给的不足。(2) 制度供给“过剩”。相对于制度需求，有些制度是多余的，或者一些过时的、无效的制度仍在发挥作用。

^① 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效应——贸易制度创新与贸易增长、经济增长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6 年版。

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包括：宪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知识积累和知识创新、制度的实施成本、现存制度安排和社会规范等。

诺斯理解的制度均衡是指各行为主体对既定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的一种适应状态，既现行的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的任何个人或组织带来额外的收益或利润，即现行的制度结构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与之对应的制度非均衡是指行为主体对现存制度安排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意欲改变但未改变的状态。一项制度安排如果出现了制度非均衡状态，就存在制度变迁的动机和可能。

3. 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源泉包括激励结构的调整、偏好的变化、信息成本、讨价还价能力、技术变化等。这些因素使得主体期望在新制度中获得潜在收益，即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无法获得的外部的收益；换言之，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外部收益内在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均衡打破、制度变迁的过程。

制度变革的另一大动力来自于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由于竞争压力的存在，在停滞经济中的政治企业家将被迫效仿那些更为成功的政策，而废除无效制度。全球范围内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就是一个例子。

4. 制度变迁的方式。

(1) 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新制度经济学派人物林毅夫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由政府政策、法令引入并强制实行的制度变迁类型。由于政府制度安排的力量比较大，因此制度出台的时间短、制度实施时推动力度大，政府的权威能保证制度安排较好地运行。国家作为垄断者，有制度实施成本与组织成本方面的优势，能够以比初级行动团体低得多的费用提供制度服务。但强制性制度变迁要受到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问题的困扰。

诱致性变迁是指经济主体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对现有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是对新制度安排的创造的一种制度变迁类型。在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处于基层的行为主体因为发现潜在获利机会而先有制度需求，然后自下而上产生对制度的需求或认可，直至影响决策者，使他们安排更好的制度。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边际增量调整的性质，是一种渐进的、不断分摊改革成本的演进过程。股份公司制制度、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都是诱致性的变迁。

(2) 渐进式制度变迁与激进式制度变迁。从制度变迁量变与质变的过程看，制度变迁可以分为“渐进式”与“激进式”两种。渐进式制度变迁是采取分阶段、分部门、分群体的方式，在较长时间内，从部分到整体、从体制外到体制

内、从增量到存量逐步推进改革。它具有时间长、社会震动小、风险小、阻力相对较小等特点。渐进式改革采取局部推进方式，因而容易控制，可及时消除改革中的社会矛盾。

但是，渐进式改革速度慢，改革的每一阶段还易于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增加下一阶段制度改革的新阻力；而改革若分阶段进行，则必然出现新旧两种体制长期并存的局面，这极易导致分配不公、经济与社会秩序混乱等问题。

5.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诺斯为研究制度变迁从技术理论引入的一个工具，用以描述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初始制度安排的刚性和惯性。他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所谓“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不断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还可能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要打破路径依赖，转入新的发展路径，往往需要借助强有力的外部冲击，通过引入外生变量来实现。路径依赖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于利益因素：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些在现存体制中享有既得利益的利益集团。一般认为，利益集团是由一群拥有共同利益、在社会中占少数的人组成的团体，其目的在于力求对国家立法或政府政策施加于己有利的影响。它们对旧的制度或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即便新的制度较之现存制度更有效率，它们也会力求维护、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可见，当既有的利益集团认为新制度的推行将使自己的利益受损时，制度变迁将变得不可能，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就会长期存在。

（三）制度创新

创新的概念和创新理论是由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和阐发的。在熊彼特看来，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森和诺斯于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研究了制度变革的原因和过程，并提出了制度创新模型，从而补充和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学说。

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潜在市场利益）而对现行制度进行变革的措施与对策。通过制度变革可以建立起某种新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形式。如股份公司的出现，工会制度的产生，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都是制度创新的结果。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一样，都是以获取追加利益（潜在市场利益）为目的的，因而制度创新必须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

（四）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制度把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取决于它们允许专业分工和进行贸易的范围；取决于准许找出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人们一旦有可能抓住经济机会，便会出现增长，如果经济增长，制度就要适应形势，以便保护积极性和促进贸易”。^① 即有效的制度能使人们的努力与获得的收益相适应，能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和贸易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增长，制度又会进行相应调整，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新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明确提出了制度创新决定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② 他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指所有权结构清晰的组织。而一国或一地区之所以能够创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基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因为新制度的创建需要成本，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前提下，行为主体才会努力去创建新的制度。而一国或一地区一旦创立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会对个人的经济活动产生激励作用，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诺斯通过对欧洲一千余年的经济史的考察证实，西欧的兴起正是因为其率先具备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随后的一些实证检验也验证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的理论。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斯卡利（Scully）选取了 115 个国家 1960 ~ 1980 年间的经济增长率数据检验其与制度间的相关性。实证结果发现，经济增长与各国制度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制度框架对经济效率和增长率有重大影响。政治开放、尊重法律规则、私有财产和资源市场配置的社会同没有这类自由的社会相比，增长率要高出 2 倍，效率要高出 1.5 倍”。^③

二、制度与贸易发展

无论是传统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均假定各国的市场制度基本健全，而这些理论对于市场制度和其他经济制度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解释则显得颇为无力。而制度经济学家则基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的理论基础，论证了制度、制度变迁与贸易发展的关系。

（一）道格拉斯·诺斯的“国际贸易由制度启动”命题的提出

道格拉斯·诺斯等人的研究发现：（1）如果按标准新古典贸易理论，发达国

①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②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效应——贸易制度创新与贸易增长、经济增长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家与欠发达国家、穷国与富国的贸易会使这些国家的发展趋同。然而,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差距被拉大了 (Grossman, 1991)。(2) 大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在世界贸易额中的比重下降,^① 说明比较优势理论的运用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导致贸易的发展。(3) 不论在中世纪晚期, 斯密和李嘉图时期, 还是当今的世界, 有大量的证据说明存在比较优势的国家不一定有发达的贸易, 而没有李嘉图意义的比较优势的国家, 也有可能产生发达的贸易, 例如当今的日本、韩国和以色列在资源相对劣势的情况下也创造出了竞争优势。(4) 新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虽然给发展中国家的后来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 但是, 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国家外, 许多国家在技术、教育、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 (例如印度), 也没有对改变产品和产业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后发展国家如何利用外贸理论中的技术因素, 在新贸易理论中没有答案。

可见, 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把制度因素排斥在其假定之外暴露出很大的缺陷。诺斯从历史的演进角度考察了制度对贸易的作用。他认为, 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由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联系发展所启动的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 1989)。事实上, 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迄今的世界经济史, 有大量的证据说明存在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不一定有发达的对外贸易, 而没有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 往往却有发达的贸易产生。荷兰和英国早年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在相当大程度上靠的是国家制度变迁、法律的制定、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当今世界上一些资源短缺、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 如以色列等依靠制度创新也创造出了竞争优势,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同时另外一大批具有各种资源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却未出现相应发展。由此表明不同的制度安排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诺斯从制度安排的演进角度, 提出了“贸易由制度启动”的命题。制度和产权等理论的引入, 极大地扩展了贸易理论应用的空间, 对补充解释现有西方贸易理论的上述未了的课题, 提供了新的视角。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发挥对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 其中, 明晰的产权制度产生的激励机制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其中最为主要的路径。但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非正式制度 (如国家的意识形态、精神文化产品等)、正式制度、交易费用等都是难以量化的。因此, 在数学工具的应用方面有很大难度, 造成了数理方面的不易整理, 不易纳入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因而, 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创新与贸易发展的理论机制的分析具有相对独特的逻辑架构。

历史上从事跨国贸易的企业家常见于欧洲国家, 而在文明程度较高的东方国

^①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 世界银行 1993 年版。

家如中国和印度却不多见,导致这一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是否具有私有产权的保障制度。^① 欧洲早年的制度安排,如私有产权的界定与保护、专利制度等对企业家的创新和财富的聚集有极大的激励,刺激了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大大有助于企业家水平的提高,以致早期欧洲的殖民国家如荷兰、英国、法国等国的企业家不惜远渡重洋,把国内市场扩大到几乎整个世界(包括殖民掠夺和殖民贸易)。后起成功的东亚一些国家(地区),固然不具备西欧那样高度发达的对个人私有产权的保护制度,但是,近代以来在外国竞争的冲击下,一些国家(地区)通过许多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如政府对大财团和家族企业的支持,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也在不同程度上达到了保护企业家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中国台湾省、新加坡在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取得巨大的成功,一些研究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得益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美国订货在战争中培养了一大批熟悉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的企业家,为推动这些国家和地区后来的贸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孙杰,1997)。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制约了企业家的形成,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激励,企业家或人力资本的存量则不足,而这会直接影响该国贸易的发展,影响其比较优势的发挥。

综上所述,比较优势是潜在的,诸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而诸多市场发育较早、制度安排较完善的国家能启动比较优势和创造竞争优势,说明比较优势是可被发掘和利用的。制度是人们创造并约束人们的游戏规则,有竞争力的游戏规则能激励人类潜能的发挥和启动比较优势、并创造竞争优势。因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进行制度学习,推进制度演进,从而通过有效的制度变迁发挥比较优势以推动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 制度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内生变量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断引入新的资源变量以构建新的国际贸易模型的过程。在李嘉图的国际贸易模型中,只有一个内生性的资源变量即劳动。国际贸易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存在着比较利益,而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成本差异是比较利益的基础。显然,李嘉图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其劳动价值理论为依据的。但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同或相近的国家之间为什么也会发生贸易?

赫克歇尔和俄林引入了另一重要变量——资本资源,回答了上述问题。H-O模型将生产资源分为两大类:劳动、资本。不同国家的比较利益或相对成本的不同是因为其资源或要素的价格存在着差异,而资源或要素价格的差异取决于

^①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各国的资源禀赋。总之，每个国家最终将出口能利用其充裕的资源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资源的进口商品。然而，里昂惕夫以美国为例对 H-O 模型的实证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惕夫悖论。^①

人们在试图解开里昂惕夫之谜的过程中，又引了第三变量——自然资源。然而，以自然资源与资本的互补与替代给出里昂惕夫之谜的谜底显然是乏力的。至于“人力资本说”与“生产要素密集性逆转说”只能说明局部与个别，而无法说明整体与一般。

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大量新现象，例如，国际贸易的垄断竞争、新技术保护主义、产业内贸易等，这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也促进了新贸易理论的形成。首先，引入了第四变量——技术资源。李嘉图模型与赫—俄模型都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分析，因而无法解释比较优势的转移与国际“赶超”型发展战略。克拉维斯（Klavis）与波斯纳最早将技术变量引入国际贸易模型，提出了技术差距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后来，克鲁格曼（Krugman）提出了学习曲线和 R&D 投资，并考察了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动态比较优势分析完善了静态比较优势分析。其次，引入了第五变量——市场资源。传统贸易理论以“规模收益”和“完全竞争”为基本假定，即以一种非常理想的市场结构为前提。但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是“收益递增”与“不完全竞争”现象。于是，就有经济学家将市场资源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引入国际贸易模型，如波斯纳（Blassa, 1967）、克拉维斯（Klavis, 1971）、张伯伦等提出规模经济问题，林德提出偏好相似论。然而，蒂克斯（Dixit）和斯蒂格利茨曾做模型证明，贸易可以在完全没有技术和禀赋优势，偏好明显不同的情况下发生。同时，也发现，在资源禀赋互补，具有明显比较利益的国家之间，贸易并不能充分展开，而许多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以色列在资源相对劣势的情况下由于有良好的制度保障也创造出了竞争优势。因此，要深入探究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就需要引入第六变量——制度资源。从重商学派到李斯特，再到凯恩斯和克鲁格曼，都十分重视国家对贸易的干预和贸易政策的影响，但在他们的国际贸易模型中，一般都将制度作为外生性变量。正如 D. 拉宾和埃维瑞（D. Rapkin & W. Avery）所言：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远远超出主流经济学关于运输成本和贸易政策所涉及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保护主义的国际经济学范围。因此，制度因素就显得比一般的经济分析更为重要。新古典贸易理论抽象掉了制度因素这个重要环节，一步跨越到用贸易政策理论来解决国际贸易问题，显

① 谢辉：“制度变迁与对外贸易发展问题研究”，2006 年硕士论文。

然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而,在解释真实世界现象中暴露出许多不足。^①

诺斯在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考察制度对贸易作用的过程中,提出了“制度启动贸易”的命题,将制度变量引入其国际贸易模型中,极大地扩展了贸易理论的解释力和应用空间”如果用Q表示国际贸易,用L、K、N、T、M和S分别表示劳动、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市场与制度等资源变量,则我们可以得出最简化的国际贸易模型:

$$Q=f(L;K;N;T;M;S)$$

三、制度变迁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

制度变迁是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相关制度的变迁。例如随着一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贸易实力的增强,其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通常会相应的逐步减低,二者又会进一步促进一国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还进一步扩大了交流的空间,从而使制度选择的范围得以扩大,使更高效率的制度安排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视野。制度学习使得交易成本降低,技术学习使得贸易的产业基础更为坚实,这都提高了对外贸易发展的效率。制度变迁是对外贸易的起点和动力,对外贸易的发展又使制度变迁有进一步延续下去的动力。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大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定型。因而,在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中若把制度看成既定的外生变量,对其增长绩效解释的影响相对较弱。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通常存在着制度短缺或是制度不完善的普遍现象。通过变革传统制度,实现有效率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将是巨大的,因而制度或体制变量的解释力在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是不容忽视的。

任何一国的对外开放都是从制度变迁开始,发展中国家由封闭或相对封闭状态走向对外开放后,一方面增进了对国外制度安排的了解,有助于借鉴、学习外部有效的制度,使制度创新的成本降低;另一方面,对外贸易作为国内外经济联系的最重要部门,会率先产生制度变迁的要求,由此必将引发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同时,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人们的视野被大大拓展,思想观念、意识形态随之发生变化,一国进行有效制度变迁的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在制度安排使得生产性活动有利可图时,才会出现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又是财产权的界定。而国家是财产权保护的主要承担者,因而一般而言,贸易制度的变迁首先要靠国家来保障和实施,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制度变迁中起着主导作用。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政府经济调控能力提高,

^① 孙杰:“克鲁格曼的理论‘接口’和诺思的‘贸易由制度启动’的命题”,《经济研究》,1997(2)。

调控手段日趋成熟,各种贸易政策措施日益规范,从而可以大大降低贸易的交易费用,提高贸易的效率。

贸易制度的变迁一方面是基于发展中国家强烈的发展对外贸易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愿望的自主行为。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中,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进入、本国与国际经济组织联系的加强、双边及多边政府间经济协定的签署都将使不同国家的法律、政策以及贸易惯例相互碰撞,不断调适,因而外部力量对一国贸易制度的选择必然发生重要影响,从而推动一国贸易体制的改革,加速其实施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制度,实现贸易制度的不断变迁。

第二节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 改革的过程与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果,成为推动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对外贸易体制是对外贸易经营管理体制的简称,是指对外贸易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管理权限、经营分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它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的计划、外汇、财政、信贷、物资、税收、价格等体制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对外贸易体制包括国家宏观管理体制和外贸企业的微观经营体制两个方面。对外贸易体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根据经济基础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在经济条件发生变化以后,就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革。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体制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实行国家统制专营,外贸经营权高度集中。这种外贸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是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和必然结果。然而,这种体制既不能调动地方和企业自主经营对外贸易的积极性,也阻碍了外贸资源的合理配置,不利于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循环。

(一)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建立与变迁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是适应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一成立,人民政府立即废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没收了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的外贸企业,建立了国营对外贸易企业,并逐步改造私营外贸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集中统一的以国营外贸专业公司为主体的对外贸易体制。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了对外贸易部,集中领导和管理全